
中国人大等单位举办的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刘 晓

1995年8月15—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石油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70余名学者分别来自英国、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俄罗斯、美国和东道主中国。会议共收到论文70余篇。与会学者就中国抗日战争史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讨论情况作一概述。

(一) 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一些学者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作了论析。他们说: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打破了近代中国抵抗外国侵略屡战屡败的局面,一洗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抗日战争为其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一些学者还论及,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统一、团结的转折点。学者们论证了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的伟大凝聚力,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强大政治基础,是抗日战争得以胜利的根本原因。

有的学者还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特点,如全民族的动员,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汇合,敌后游击战在战争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等。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主战场,中国军队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战场开辟的最早,坚持的时间最长,所作的牺牲最大。中国抗日战争,阻止了日军北攻苏联,推迟了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粉碎了日军与德军在北非会师的图谋。它以其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建树,使中国赢得了世界大国地位,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1945年联合国成立,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

有的学者还研究了中国军队越过国境入缅参加反法西斯作战的重大牺牲与贡献。

(二)抗日战争中的政治

关于国共关系,有的学者分析说:国共两党都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们不是作为对立物而产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由于国共两党有“平行的利益”,所以,在一定历史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历史的必然。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是双方共同的“平行利益”,但又存在各自对立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信仰的“异”,即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两党的主张是对立的。故国共合作是对立中的合作,合作中的并存。因此,在合作中有时矛盾很尖锐,很激烈,甚至出现象“皖南事变”那样的严重事件,但又始终没有分裂。国共双方实行的仍是抗日第一,磨擦第二;民族矛盾第一,阶级矛盾第二。这是当时历史铸成的客观形势,也是国共合作的规律。有些学者阐发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中流砥柱作用。有的学者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归结为四点:1,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全民族抗战的胜利进行,是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2,中国共产党提出和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中国抗战胜利开辟了

胜利之途。3,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坚持中国长期抗战并争取抗战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四、中国共产党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为振兴中华,为中国人民规划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蓝图。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者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从政治上看,中国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从组织上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领导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这可以说是分别领导。

一些学者还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思想和领袖人物的思想与实践进行了论述。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与爱国主义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统一战略策略思想深刻反映了爱国主义精神;而爱国主义精神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重要基础。有的学者说,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思想,在军事科学领域中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是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一些学者认为,重庆国民政府与南京时期的国民政府相比有其特点:第一,重庆国民政府是一个抗战政府。第二,重庆国民政府是一个党政军一体化的政府,全国的党政军大权都集中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重庆国民政府是一度呈现出某种民主趋势的政府,从国民参政会、省市县参政会到周恩来、黄琪翔等中共及民主党派代表参加政府等,可以得到佐证。第四,重庆国民政府更是一个呈现党政独裁化的政府。

(三)抗日战争中的军事

一些学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敌后游击战争及其对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有的学者认为,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二者既统一又独立,“互相需要,互相协助”,是两个战场之间的基础关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两个战场统一性的基本内容。由于两个战场之间的联系缺乏固定的形式和手段,自成体系,独立作战,又是它们关系的一个明显特征。还有人分析了中国空军对日作

战的得失。

一些学者对于重要的国民党抗战将领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论及人物包括李宗仁、张自忠、张治中等。也有人对高宗武在汪精卫叛国投敌过程中的作用作了论述。有些学者对安徽、江西、新疆、黔南等省区的抗战情况作了论述。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讲师三好章认为,陈毅多次赴泰州与二李谈判,这对新四军在苏北的立足与发展相当重要。苏北新四军力量的聚集发展成为国民党的隐忧。国民党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军部与江北指挥部会合的疑惧,是造成皖南事变的真正原因。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

一些学者论述了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有的学者指出: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中国组织对日经济战,取得了巨大成功。还有学者综合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政策,认为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值得肯定的是:(1)保证了国民政府军队及机关的粮食供应;(2)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国统区的社会秩序;(3)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以战养战”政策。其保守处是:维护落后反动的土地政策,征粮方式极不公平。

有的学者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分析石油工业在抗日战争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从石油对战争作用的角度出发,论述了石油工业与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作用的关系。

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讲师纪保宁对战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做了论述。她认为:工合运动既是一项抗战的经济策略,同时又在本世纪中国农村改造史和中国民主抗战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她还论述了工合运动在大后方、游击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发展的不同特点。认为:在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大后方,是可以建立较大的工厂和充分发展工合项目所要求的相应的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在游击区,合作企业必须是很小并且易于移动的,它必须与游击运动相配合。在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国民党对陕甘宁的紧密包围,对陕甘宁工

合运动的发展很不利；另一方面，陕甘宁地区的工合运动避免了在其他大多数地区由于国民党派系斗争和领导人之间相互对立而导致的衰退。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副教授列娜·切尔内赫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及其重要意义。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区域的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一方面保证了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健全了农村经济生活，为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一定前提。

（五）日本侵华政策与战争罪行

关于日本侵华政策，有的学者提出，近代以来，由于内外各种因素，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出局部性和间歇性，逐渐推进。而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迅速向全局性和连续性演变，这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相当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影响到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即对中国国民政府从诱和政策转变为不以之为对手的政策；在华北、内蒙古和华中建立伪政权“分治合作”的政策；面临战争长期化与对苏谋略，日本陆军省战面扩大的主张占居主导。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安井三吉、博士研究生内田尚孝论述了1935年以后华北的政治情况，认为正是由于《塘沽协定》，使日本不断展开的“华北侵略”得以“合法化”，从而导致了其后卢沟桥事件以及日中全面战争的爆发。

还有的学者分析了战时日本对华中华南的统制金融措施与步骤，指出日伪实施金融统制的目的在于大量掠夺军需物质、实行所谓“经济战”。有的学者说，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经济，实质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绝对统制和疯狂掠夺的殖民地经济。还有学者论述了日本在沦陷区利用宗教进行殖民教化的情况。认为日本在沦陷区控制和利用宗教有进行社会权力控制的功能，这是研究日本侵华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学者们还论及日军在华暴行，大施屠杀、狂轰滥炸，还进行化

学战毒气战,对我国军民施毒残害。日军在华实行化学战是在日本统帅部的具体命令下施行的,其地域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次数之多、罪恶之重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六)华侨与国际友人抗日活动及国际关系

马来西亚的蔡永华系统阐述与分析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过程。他认为:新、马华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在侨居地所发动的一系列抗日救亡工作中所做的努力,体现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具有很大的意义。有的学者论述了国共两党的华侨政策。韩国留学生崔承现阐述了在华朝鲜人的独立运动和抗战活动的历程及国民党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政策。有的学者论述了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有的学者论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抗战的关系。

关于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的学者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苏日三角关系的演变,认为这种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德意日三国同盟订立前夕中日两国成为交战敌国;苏联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中苏关系大为改善;苏日关系日趋恶化,但双方均比较克制,维持两国间的和平。从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订立到1943年下半年,苏日两国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开始积极改善彼此关系,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但两国的矛盾却终难以得到调和;苏日关系的变化对中国的抗战造成一定的损害,但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采取了克制态度,加之苏联没有完全放弃援华制日政策,中苏关系未从根本上动摇;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中苏两国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但由于新疆问题的发生,中苏关系却一度恶化,这对中国的抗战又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从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联最终决定放弃苏日中立条约,准备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日本虽对苏联存有幻想,一再寻求苏联的支持,但却无法阻止日苏关系的逆转;通过雅尔塔会议和中苏谈判,苏联决定参加对日作战,虽对中国最后战胜日本有很大帮助,也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但中国却被迫付出了不小的代

价,使自己的主权和利益受到了损害。

有的学者分析,“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提法不够准确,日本是在保留天皇制的条件下投降的。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张注洪对国外和港台中国抗战史的研究进行了评析。他认为,国外和港台有关抗战史研究无论是史料还是研究方法均有可供参考之处,宜加强对国外和港台研究抗战史的信息了解、论著翻译和成果评价。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